

紀念吳世昌先生專輯

海寧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



## 前　　言

吴世昌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深受人们敬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刻苦学习，积极投入爱国学生运动。半个世纪以来，他为了祖国的独立与繁荣富强，奋斗不息，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培养青年一代专家学者，作出了永为人们传诵和铭记的贡献，并以红学研究著称于世。他生前是我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全国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主席团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终年七十八岁。

今年八月三十一日，是吴世昌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为了使人们能进一步了解吴世昌先生一生的光辉业绩，让家乡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学习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并继承他的未竟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继续努力，我们特收集了吴世昌先生逝世后全国报纸刊物（包括香港报纸）上所发表的纪念文章，汇编成这册专辑，奉献给读者。由于时间短促，见闻有限，在编辑和排印工作上极可能有错漏不当之处，敬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承吴世昌先生的亲属严伯昇同志及吴令安、吴令华、吴新民等同志大力支持，并承嘉兴市志办、嘉兴市政协文史委、海宁市图书馆等单位给予鼎力协助，又承鲍彤同志为本书封面题签，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海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1987年12月

# 目 录

- 前言 .....  
沉痛悼念吴世昌先生 ..... ( 1 )  
深切悼唁吴世昌先生 .....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 5 )  
怀念世昌 ..... 严伯昇 ( 7 )  
怀念爸爸 ..... 吴令安 ( 13 )  
献给一位正直的中国人的哀思  
——吴世昌教授的几件事 ..... 鲍彤 ( 19 )  
吟旧句 念平生 奉圭臬  
——纪念舅舅吴世昌 ..... 吴令华 ( 26 )  
怀念舅舅吴世昌 ..... 令华 ( 33 )  
爱国，岂能不付出代价  
——记吴世昌先生爱国二三事 ..... 盛祖宏 ( 35 )  
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  
——吴世昌先生小传 ..... 施议对 ( 41 )  
子臧先生治学生涯片断 ..... 施议对 ( 48 )  
一饷太情真  
——忆吴世昌先生治学二三事 ..... 史美圣 ( 55 )  
哭吴世昌先生 ..... 冯其庸 ( 60 )  
悼念吴世昌先生 ..... 李希凡 ( 63 )  
悼念吴世昌 ..... 胡文彬 ( 65 )  
敢将肝胆照生平  
——痛悼世昌先生 ..... 周雷 ( 69 )  
高山仰止  
——忆吴世昌先生 ..... 曾兆惠 ( 78 )  
学者与小学生之间 ..... 王雄 ( 82 )

- 忆吴世昌老师 ..... 孙其敏 (84)  
雨霖铃 悼吴世昌兄 ..... 端木蕻良 (85)  
减字木兰花 哀悼世昌先生 ..... 万云骏 (86)  
挽吴世昌先生 ..... 宋谋玚 (87)  
挽子臧师三绝句并序 ..... 施议对 (88)  
  
附录：吴世昌先生自传 ..... (89)

## 沉痛悼念吴世昌先生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委会委员、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世昌先生因病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七时十三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七十八岁。

吴世昌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受人敬重的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我党的诤友。早在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五十多年来，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繁荣富强，与我党长期合作，竭忠尽力，奋斗终生。他的逝世，是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吴世昌先生字子臧，浙江海宁人。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出生于海宁县硖石镇。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十二岁当学徒。由于艰难岁月的磨炼，从小对于国家和民族就有深厚的感情，有着一股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他刻苦自学，一九二五年入嘉兴秀州中学当“自生”（工读生），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学完全部中学课程并考上南开大学预科。一九二八年人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被破格吸收为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吴世昌先生素以红学研究而著称于世，他以英文写作的长篇巨著《红楼梦探源》，为红学研究别辟蹊径。但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红学家，而且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词学家，一位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学问家。吴先生治学的兴趣相当广泛，在文史研究领域里是一位通才。他近年出版的《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所收论文，有古今文学的比较研究，古典诗歌、乐府中问题以及宗教学问题的探讨，敦煌学中有关资料的考订以及旧中国丧失文物的调查报告，几乎包括了文史研究

领域的所有方面。他在英文系二年级时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释〈书〉〈诗〉之“诞”》，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立即被译为德文、俄文。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编著《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称：“吴氏就学期间以来，尝试多方面的著述，文史无所不通”。五十多年来，出版学术专著五种，在国内外上百个刊物发表文章数百篇。此外，还有大学讲义三种及待整理的书稿若干种，约五百万字。吴先生以探本、求实、存真的精神，在文史研究各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研究，他的成就得到了国内外学人的推重。

吴世昌先生于一九三六年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历任西北联合大学国文系讲师，中山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央大学教授。一九四七年应聘赴牛津大学讲学，由该校授予文学硕士学位，并任牛津、剑桥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一九六二年归国，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一九七八年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同时，他还亲自指导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吴先生善于奖掖人才、扶植后进，不仅尽心尽力培养学生，对于来信来访求教者，即使素不相识，也还是满腔热忱，认真负责，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吴先生是一位受人敬重的教育家，在国内与国外，培养了一批批学术研究人才，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吴世昌先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学生时代，正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一面发愤攻读，一面热情参加爱国救亡活动。“五四”运动时，他在秀州中学读书，曾积极发起学生爱国运动。在燕京大学被推举为学生抗日会第一届主

席。“九·一八”事变后，他和他的哥哥吴其昌教授一起，为逼蒋抗日，奔走呼号。他自己主编抗日刊物《火把》，并和杨刚同志合编抗日刊物《大众知识》，发表大量有关时事的政论文章。日军侵占北平，他辗转至大后方，仍与爱国进步力量保持密切联系。在重庆，他曾参加中共中央办事处组织的活动，并且撰写大量与国事相关的论文，鼓动抗日。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文，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在英国讲学时，他密切关注国内解放战争形势，坚信中国即将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和我驻英、驻欧机构保持密切联系。旅英十五年，他曾在海外许多刊物发表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文章，为英国《人人百科全书》写了有关中国的条文二百多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人的传记，并多次出席在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苏联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他身居异域，心系中华，时时刻刻关心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情况。一九六二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尽管美国康奈尔大学、澳大利亚、新加坡的一些大学聘请他担任教授，但他一一婉言谢绝，毅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率领全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吴先生说：“我是中国人，不怕中国穷。”十年浩劫，他受到极大冲击，自己被下放农村种菜，家庭也遭到极大的不幸，他仍然不反悔。说：“爱国是大事，岂能不付出代价。”“即使预先料到有这么一场‘革命’，也还是要回来的。”他对“四人帮”一伙的罪行极为痛恨。在围剿《海瑞罢官》时，他在一次全国性的座谈会上发言，公开反对搞“文海战术”。在文学研究所，他也曾孤身一人公开揭露运动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他对周总理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感情深厚。“四人帮”反总理，他非常气愤，曾在公开场合进行谴责。他拒绝参加“批邓”。“四人帮”垮台后，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

策。对我党的工作，凡是做得好的，就竭力支持；发现缺点，即直言不讳，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正义所在，真理所在，不计安危。住院期间，他仍关心形势；读到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的报道，为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功而感到无比快慰。在病情稍有好转时，即兴致勃勃地谈论国家大事，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充满信心与希望。

吴世昌先生晚年，除了发奋著述，培养研究生，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是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一九七九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当选为全国委员。六届人大以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忠心耿耿地工作，其严肃认真的作风，更加受到人们的敬重。

“平生未作干时计，后世谁知定我文。”这是吴世昌先生为人、处世、做学问的座右铭。他不为名，不为利，勤奋著述。他从青年时代起，因患目疾，视力极差，但直到晚年，总是彻夜不眠，拼命工作。他刚直不阿，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不讲违心的话，也不做违心的事。真以待人，严以律己，时时刻刻以“认真”二字要求自己。几十年来，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对待周围的一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未丧失本真。他的这种品德是十分可贵的。

吴世昌先生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全心全意地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奋斗。他的业绩永存，他的精神为学界共敬仰。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并继承他的未竟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继续前进。

吴世昌同志治丧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

## 深切悼唁吴世昌先生

著名红学家、本刊(编者注：《红楼梦学刊》)编委吴世昌先生，因病不治，于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七时十三分在京逝世，享年七十八岁。对于吴先生的逝世，本刊编委全体同志，谨致深切的哀悼。

吴世昌先生，浙江海宁人，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生。他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十二岁当学徒。由于艰难岁月的磨炼，他从小就有一股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一九四七年，他应聘赴牛津大学讲学，并任牛津、剑桥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旅英十五年，他于一九六二年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率全家自费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此后，他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从一九七九年起，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吴世昌先生是现代作家、诗人和教授，尤以红学研究著称于世。一九六一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红楼梦探源》，这是六十年代红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在西方《红楼梦》读者和研究者中有很大影响，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其书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全书五卷二十章，对《红楼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论述。可惜的是吴世昌先生归国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能够出版本书的中文版，所以在国内未能被广大读者所知。

一九八〇年，吴先生又出版了《红楼梦探源外编》，其中收录了他从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九年发表于国内外刊物上的二十余篇论文，他还在该书的“前言”中，比较带感情地揭发了“四人帮”在十年浩劫中，借评“红”所玩弄的种种阴谋。一九七九

年以后，吴先生一直担任本刊编委，对刊物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也没有停顿研究《红楼梦》和撰写红学文章，一直到他的逝世。

吴先生晚年，除了发奋著述，培养研究生外，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是政协第四、五届全国委员。六届人大以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世昌先生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的逝世，是我国文化教育界的损失，更是红学界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并继承他的未竟之业，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继续前进！

愿吴世昌先生永远安息。

###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九月八日

(原载《红楼梦学刊》一九八六年第四辑)

# 怀念世昌

严伯昇

世昌逝世已一年了，他的遗像挂在客厅里，他微笑着。我常常呆呆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凝视他，想从他的微笑中知道他要对我说些什么？世昌，你在微笑着，你是在鼓励我活下去吗？或者你又在想着什么使你高兴的事儿？你高兴什么呢？我想知道！是的，你已经离开我一年多了，你永远离开了我，你再也不会来了，可我就不相信这是真的！

世昌，你知道吗？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到你离开人间，只差两天就是半个世纪，五十年了！在这五十年中，我们俩在人生的旅途中经历的漫长的坎坷的生涯，所尝到的酸甜苦辣说得完吗？写得完吗？

1936年，我在江苏松江女中毕业了，当年考取了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我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先当小学教师，后当初中教师），看见我考取了国立大学，他既高兴又发愁。因为在我的家乡（江苏泰兴县黄桥镇）女生考取国立大学我还是第一个呢。那时日本人已占领东北，华北局势也紧张了，他为我的安全担心，多方打听谁要到北平去，就可托他带我同行。终于他打听到镇上有位燕大的研究生即将动身去北平，我父亲就托他路上照顾我。那位老乡路上帮了我不少忙。我大概是八月底到北京（平）的。到师大报到时，要两个担保人，当然我的老乡愿意担保，但还得另外再找一担保人，他找了他的朋友吴世昌，我就这样认识了老吴。

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他很瘦长，面皮干黑，穿着一件很旧又褪了色的熟罗长衫。脚上穿了一双张开“咀”的旧黑皮鞋，戴了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看得出他的眼睛不好，

因为他常用手帕擦他的左眼，左眼显得大些而且凹进去。可他的风度是那么潇洒，那么自然，毫不拘束，谈吐非常幽默，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家里很穷。他就这样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是贵族的燕京大学的学生，那儿的学生大部分西装革履，但他却有名“燕京布衣”。他八岁丧母后，由于眼疾，瞎去一眼，但他毫不气馁，毫不自卑，发奋自强，勤思学习。可贵的是，他经济虽困难，靠稿费过日，但他从不想他自己。他对自己的祖国很热爱；对当时的时局很担忧，竭力主张抗日。他从事抗日爱国运动的事报上也记载过。他对我也讲过些，但没有其他同学对我说的多。他有许多支持他的同学。

今年全国纪念芦沟桥事变50周年，使我更想念他了。那是1937年7月间的一个晚上，由于形势太紧张，世昌的四个同学（杨刚和她的爱人郑侃（？），连士升和他的爱人郑侃慈）还有我，都呆在世昌的居处。我们都心情沉重，一夜没睡，听着远郊区的炮声。到天快亮时炮声越来越远，后来停止了，天也亮了，大家认为一定是我们将日本人打退了。世昌和他的同学立刻冲出去到外面看，但他们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我外面贴满了汉奸的标语，殷汝耕出头露面了，伪组织维持会公开了……怎么办？北平呆不住了，大家得走！可现在怎么走？我们到朋友家打听消息，但不多久就有他的学生来告诉他：日本人进北京城了，要抓人；还传说有一张黑名单，名单上有吴世昌的名字（他曾是燕大第一届学生抗日会主席），接着又有人劝他暂时离开自己的居处，到别处呆几天。

1937年8月10日我们结婚了。在结婚的前几天他告诉我，他没有钱。我说：“结婚不必花钱”。结婚后我们先住在世昌的同学家两周，后来在唐兰先生家呆了两周。唐先生认为吴世

昌应去南方。估计到天津火车站是件麻烦的事，我们就做了一些准备，说他是北平历史研究所的眷录员（他原是编辑），我打扮成一个家庭妇女，家中的东西，除了将书籍存在朋友家之外，其它的家具和厨房生活用品都卖了，将一切信件都烧了。事后，我觉得有些信件烧了很可惜，如朱自清、郭绍虞、郑振铎、胡适等人的信。

我们坐上去天津的火车，当时同走的还有另一对秧石夫妇。在车上我害怕日本人把世昌抓去。到达天津一下火车，就看见许多日本人分左右排成很长的两行，他们将枪高举对顶着，从火车上下来的客人都得从他们的枪下过去。日本人看着谁不顺眼，就拉到一边不让过去。我刚走过去了，忽然听见后面有人轻声说：“世昌被扣住了”。我回头一瞧，果真世昌被他们拉在一旁不让走，我也不敢走了。过了好一会儿让走的人都过去了，扣下的人被日本兵命令四人排成一行向前走。好多日本兵押着我们，说我们走得不整齐，拿枪托打我们。我们被日本兵带进一幢大楼，从一条很狭窄的楼梯上去，走进一间空屋，中间坐着两个日本人，一个汉奸当翻译。先审讯别人，我的心跳得很厉害。等到审讯我们时，世昌说：“我叫吴子威，北平历史研究所的眷录员，我妻子是家庭妇女，她有妇女病，到天津来看中医，几天后就回北平。”他们打开了我们的箱子，内中没有东西引起他们的注意，又看了看我，我本来就瘦，又加上几天未睡，没能好好吃，显得很憔悴，那时说我有什么病都像。这样才放了我们。出了大门，我说：“我们到法租界去，住六国饭店，这样安全些。”世昌同意了。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金岳霖先生、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他们见了我们很高兴。金先生还说他们有办法买到去青岛的船票，也可以替我们买。我们很感激他，请他们替我们买了最便宜的统舱票。

以后我们就没有见到他们三位，那两位硖石老乡也不知去那儿了。

我们在十月底到达武昌，投奔世昌的哥哥吴其昌先生。在那儿我们住了两个多月。这时我们经济很困难，我在武大外语系借读，连买几本课本的钱都没有，后来他给《大公报》写了一篇关于北平的沦陷和他如何离开那儿的报道，拿了元稿费，这才解决了我必须要买的两本英文课本。那时我已经怀孕，身体很不舒服。他也觉得不能总是呆在武昌，所以当打听到西安有北平历史研究所的临时机构时，他就一个人去西安了。我也离开了武昌，跟随姐姐到湖北荆州，因为武昌的形势也一日比一日紧张。世昌到西安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也都迁到西安，成立了西北联大。我在荆州接到世昌的来信说，北平历史研究所发了他一部分生活费，他给我寄来了钱，要我也去西安。我到了西安不久，就向师大报到。那时日本飞机天天来轰炸，西北联大要迁到汉中城固县。世昌见到了黎锦熙先生，他约世昌去西北联大工作。我们就这样随着三校师生向城固出发了。路上遇到的困难当然很多，但大家的心情还是很乐观的，我们一路都是步行，世昌还有说有笑地帮我的同学提行李。

到了城固，他被西北联大聘为讲师。当时他的收入按照他每周上课的钟点而定。为了多拿一点钱，他除了教修辞学、文字学，还教公共英语。当时学校图书资料缺少，每门课都得自己找课本，写讲义。那时我已生下大女儿，白天还要上课，也没有办法帮助他。他为了备好课，常常工作到深夜，人越来越瘦，但他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总认为我们的国家有希望。

有一年城固忽然成立了一个献金台，号召人民捐钱买飞机抗日，世昌知道了非常激动。到了发工资的那日，他去领工资

了，回家后却一文不存。他说：“我将全部工资捐出去了。”我听了发愣，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后来才知道好些教授只捐了他们工资的十分之一。也许他们是明智的，因为这笔钱谁也不知道有没有送去买飞机抗日。但世昌热爱祖国的心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1947年底，他应聘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我1948年夏天带了孩子也到他那儿。他在牛津很辛苦，教外国学生，得用英语讲课，一切教材也都得自己准备。可他心仍在中国，每天听三次“B.B.C.”的广播，有一次他听到广播说，解放军消灭了四十五万国民党军队，他高兴极了，大声说：“这就是说共产党又增加了九十万军队的力量！”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他又是如何牵肠挂肚地听“B.B.C.”广播。有时听到歪曲事实的报道，他非常气愤，常常与朋友们争论不休。

我们是1962年9月26日回到祖国的。回到北京后，他仍注意外国报纸上对中国的报导。当他看伦敦《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报导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章，内容非常错误，他立刻写信去要他们纠正，那封信登在该报1962年12月19日第9页上。

五十年的相处，我知道世昌一生的兴趣是勤勤恳恳地从事他的学术研究，为祖国的文化增添光彩。他热爱祖国，把自己的这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伟大祖国。

1986年8月31日早晨，他在协和医院与我们永别了。但在25日晚上他还与前往医院探望他的学生一直畅谈到晚上11点，他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感兴趣，那天他的心情也很愉快，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还准备出院后参加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谁料第二天他就昏迷不醒了……

世昌，五十年的相处，你留给我的回忆太多了，我要说的话永远说不完。可以告慰于你的是：你的遗稿正在整理中，《学

术论著》第二卷将交付出版；我们的小女儿令安已经学成回国，她会象你一样把全部知识和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祖国的建设事业在继续发展。世昌，请你安息吧！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

# 怀 父 爸

吴令安

父亲已去世一年多了，有时我都感到不可相信。对儿女来说，父母似乎是永生的，因为生命是父母给的，自从有记忆开始，父母就在那里了，而且在人生的漫长道路上，多少次关键的时刻，父母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儿女。我也不例外，无论我在学校学习时，或是长大参加工作后，我都受到父亲许多影响。

1944年，中华民族正处于苦难岁月中。父亲因在北平从事抗日活动，被迫南下，正在逃难广西的路上，我出生了。听父母讲，我父亲提着一箱子书，母亲提着一包衣服和婴儿用的尿布片，雇了一位挑夫挑着两个筐子，一筐是我姐姐坐着，另一筐则是我。家里全部财产就这些。因为我身体轻，一路上筐子不断地旋转，磨擦着绳子，有一天绳子突然断了，我从筐中连人带裹着的毯子被甩出来，顺着陡坡直往下滚。挑夫吓得发呆了，一动不动，我父亲象一支离弦的箭，直飞奔过去追上我，把我拣回来。那时，幸亏掉在有草的软地上，我还睡得正酣，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四岁时，我随全家去英国；到高中毕业才回来。虽说是“吃洋面包”长大的，但由于父母的教育，我始终深深地意识到自己不是英国人，而我是中国人。在英国大学城牛津，我上的是当地最高贵的中小学，但我从没有自卑感。父亲常说，我们来自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应该感到自豪，在学习和道德方面，应该比别人强。

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但自幼头脑中有一个概念，即中国有个共产党，有个国民党，国民党是坏人，共产党是好